

#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sup>\*</sup>

张 立 胡大一

**内容提要：**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 5G 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国际博弈 选边站 第三方国家 华为 5G

**作者简介：**张立，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大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一、引言

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存在着大量的第三方国家，它们难免会被卷入到国际博弈的“选边站”困境中。所谓的“选边站”，通常是指在围绕争议性议题的两国博弈中，<sup>①</sup> 第三方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倒向其中的

---

<sup>\*</sup> 本文受 2021 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四川参与中国—南亚‘数字丝路’建设方略研究”（项目批准号：SC21B070）资助。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文责自负。

<sup>①</sup> 当前，国际社会也存在多国博弈的情况，且更为复杂，基于主题考虑，本文仅讨论两国博弈的情形。

---

《当代亚太》2021 年第 5 期，第 75～104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一方，表达对其明确的支持，从而影响博弈的演变与最终结果。比如，在中美两国围绕 5G 的议题上，有些国家选择倒向美国，排斥中国厂商的标准与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却选择支持中国的技术；在组建亚投行（AIIB）的问题上，一些国家选择追随美国，拒绝加入，另一些国家却相反，支持中国的倡议；在高铁建设问题上，一些国家选择了日本，而另一些国家却选择了中国；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罗列出一长串清单。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老牌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相互间的矛盾与博弈还将呈上升之势，如何应对好选边站现象，将愈发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选边站这一现象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比如，在第三方国家面临选边站问题时，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的最终选择？这些国家决定选边或不选边的动因何在？对此尚待深入探索。目前，国外学界对于选边站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战争、国际冲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如迈克尔·阿尔特费尔德（Michael F. Altfeld）等人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大数据分析第三方国家如何在战争中选择立场；<sup>①</sup> 杰弗里·列斐弗尔（Jeffrey A. Lefebvre）基于美国视角，以美国对埃塞俄比亚政策为例，分析了美国在 21 世纪初期非洲东北部地区国际冲突中的立场和选择；<sup>②</sup> 玛丽塔·考（Marita Kaw）从国际冲突的角度，探究了 1950～1987 年间苏联在 403 场国际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决策行为特征；<sup>③</sup> 艾塞古尔·艾丁（Aysegul Aydin）根据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分析了国家间贸易对第三方国家在武装冲突中决定是否向其伙伴提供军事援助的影响及其程度问题。<sup>④</sup>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研究的兴起，也有学者逐渐关注到中小国家所采取的制

---

① Michael F. Altfeld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Choosing Sides in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1, 1978, pp 87-112.

② Jeffrey A. Lefebvre, "Choosing Sid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Wikileaks, the Ethiopia Imperative and American Responses to Post-9/11 Regional Conflicts",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3, No 4, 2012, pp 704-727.

③ Marita Kaw, "Choosing Sides: Testing a Political Proximity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2, 1990, pp 441-470.

④ Aysegul Aydin, "Choosing Sid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state Disput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4, 2008, pp 1098-1108.

衡/追随行为,<sup>①</sup> 并从“对冲”的角度分析了中小国家试图平衡经济收益与安全风险的混合策略及其特点。<sup>②</sup> 从国内研究看,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选边站现象。如漆海霞对中美竞争态势下中国伙伴国的外交选边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数据为例,分析了它们的投票行为所体现出的外交政策选择特征,指出虽然目前多数国家在中美之间尚无明确的选边站迹象,但随着未来美国对中国施压加剧、竞争关系升级,其他各国可能将不得不选边站;<sup>③</sup> 曹玮则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亚太小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选边及对冲行为选择问题,提出了中美战略关系、小国不安全感以及小国国内合法性等因素,均从不同角度显著影响了小国在中美间的选边及对冲行为选择。<sup>④</sup>

总的来看,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对选边站现象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基于对国家重大安全或发展问题的分析而展开。如传统的联盟理论主要适用于解释长期性、稳定性的国家间合作关系,而选边站问题却涉及一些功能性、权宜性的议题,其决策影响远不及联盟决策那样宏大深远;对冲理论虽然可以部分解释选边站现象,比如,第三方国家可能出于制衡或对冲某方的需要,而选择在某特定议题中倒向一方,但无法系统而准确地说明,这些制衡或对冲究竟是怎样与特定议题产生内在关联的。尽管国内已有研究已明确提出了选边站问题,但仍是从小国整体外交行为选择的角度来展开的,并不足以解释国家在具体的议题层次上面临的选边站问题。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国际博弈可能变得更加频繁而复杂,更多体现为各议题层面上的竞争、对抗与联合等,有必要将对选边站现象的研究推进到中观或微观层次。为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并结合案例研究加以检验,以更好地分析或预测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

① Sandya Nishanthi Gunasekara, “Bandwagoning, Balancing and Small States: A Case of Sri Lanka”,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11, No 28, 2015, pp 212-218.

② John D. Ciorciari, “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9, No 1, 2009, pp 157-196; Darren J. Lim and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p 696-727.

③ 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33页。

④ 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74页。

## 二、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一个综合解释框架

如前所述，在当代国际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中，各国面临的选边站问题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的结盟这类宏大战略选择的范畴，朝向更为微观的议题层次发展。因此，本文旨在以双层博弈理论为出发点，<sup>①</sup> 对影响国家选边决策的变量展开系统分析，从体系、单元、国内以及议题四大层次入手，探究国家选边行为的动力来源，建构国际博弈中影响国家选边站决策的理论框架。

### （一）体系层次因素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分布特征被视为决定国家行为选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体系中力量分配的变化，如从多极到两极再到单极，就是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变化，它们影响了构成国际体系单元的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以及这些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sup>②</sup> 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是各国对外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sup>③</sup> 为了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求得生存和自保，国家将被迫采取追随强者或制衡等战略。如在单极体系下，遵从而非制衡霸权国家，不出意外地将成为几乎所有中小国家共同的理性选择，因为不如此，它们将受到来自体系内强权的巨大压力。同单极体系类似，两极或多极体系下的强国一般处于中心地位，它们往往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具有较大的话语权。<sup>④</sup> 在国际博弈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的对外行为选项更为丰富，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度、承受更小的体系压力。这一类国家有可能是国际博弈的参与者，本身不存在站队的选择困境。就算中心强国没有直接参与

---

① “双层博弈”理论是一种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论，指在国际谈判中，第一层的谈判者之间的国际博弈和第二层的谈判者与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都对谈判的结果至关重要。有关“双层博弈”理论的相关文献参见王传兴：《“多层次博弈”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36～39页；钟龙彪：《双层博弈理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模式》，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61～67页等。

② 聂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比较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5～127页。

③ Richard J. Harknett and Hasan B. Yalcin,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A Realist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4, 2012, pp 501-517.

④ Sophia Sabrow, “Peripheral States and Conformity to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Dilemma of the Marginalise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1, No 2, 2020, pp 188-189.

国际博弈，由于具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其本身就是博弈双方拉拢的对象，因而在决策上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可以维持中立或自由支持博弈的其中一方。但对于位于国际体系中的半边缘或边缘国家而言，<sup>①</sup> 它们一般为发展中国家或被称为“全球南方”，经济和军事实力较为落后，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较小，<sup>②</sup> 因而，它们在两极或多极的竞争格局中往往采取追随或对冲战略，可自主选择战略空间较小，是否参与选边站决策的自由度也较小。

由此可见，在国际博弈中，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共同决定了其在选边站过程中的决策自由度。决策自由度高的国家，在选边站过程中拥有的可供选择的战略相对更多；而决策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其选边站的战略决策选择也较为单一。因此，可以认为，国际体系层次因素是决定国家将在多大程度直面选边站问题，以及其选边决策自由度高低的先导因素。<sup>③</sup>

## （二）单元层次因素

无论是较容易卷入选边站问题的国家，或是国际博弈中决策自由度较高的国家，需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其作为第三方国家，在国际博弈中将作何选择？

高决策自由度的国家虽然承受的来自体系的结构压力减小，但来自双边性的单元层次因素的压力则将上升，成为决定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新变量。这些双边单元层次因素主要包括国家间（即第三方国家与参与博弈的国家）的政治安全关系、经济结构特征以及身份相似度等，它们将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对第三方国家在参与国际博弈中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呈现多极化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对国际博弈选边站中单元层次因素的考察，将主要基于政治亲密度、经济相互依赖度、身份相似度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这四个维度进行。

① Frank T. Fitzgerald,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11, No 1, 1981, pp 5-18.

② 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Wilkin, “Still Wait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e Third World’ on the Periphe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4, p 243.

③ 也有学者认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区别并非一成不变，国家可以脱离边缘，成为中心的一部分，也可以处于不稳定的地位，既位于主导国家的集体之内，也处于主导国家的集体之外。本文的研究基于一般情况下的国际博弈，试图得出一般性的研究结论，因而将一国所处的国际体系格局视为恒定不变。有关国家所处国际体系位置的转变参见 Sophia Sabrow, “Peripheral States and Conformity to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Dilemma of the Marginalise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1, No 2, 2020, pp 188-189.

### 1. 政治亲密度

政治亲密度是衡量国家间政治、安全关系友好亲近或疏离敌对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可划分为联盟、准联盟、政治合作伙伴、普通合作伙伴以及敌对等多个类型,不同类型间的政治亲密度依次递减。<sup>①</sup>

在国际博弈中,当第三方国家面临选择困境时,其更加倾向于与自身政治亲密度高的国家站在一起。双方是否结盟则是衡量两个国家政治亲密度的首要参考指标。正如联盟理论指出的,国家往往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而选择结盟。这种结盟关系反映了两国间深度的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其意义和影响在战争时期尤为明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间的团结协作。<sup>②</sup>到了和平时期,联盟关系也在一些国家间得到了延续,这时,联盟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的意义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出于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或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联盟体系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起“轴辐”体系,该体系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持主导权的关键抓手。<sup>③</sup>判断联盟形成的显著标志在于有无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共同防御条约等。签订此类正式安全防务条约的国家,其政治亲密度最高,盟国之间在对外行动时也通常具有较高的政治支持倾向。

在联盟之外,还存在准联盟,即虽然国家之间尚未形成正式联盟,但执政者运用次级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此时双方的政治关系可以定义为准联盟。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防卫合作协议的签订,导致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不断增加,促成了澳日准联盟的形成。<sup>④</sup>对于准联盟国家而言,在国际博弈中,由于在安全问题上与盟国仍然保持一致性,作为第三方的国家在面临选边决策时,仍会对其准盟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但由于二者基于安全方面的协作等级远不及联盟国家,因而准联盟之间的政治亲密度远不及联盟,在选边站时准盟友之间的支持力度较盟国间有所不足。

然而,对于中国和印度等采取不结盟战略的国家而言,联盟因素显然不

---

①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61~62页。

② Evan N. Resnick, "Hang Together or Hang Separately? Evaluating Rival Theories of Wartime Alliance Cohes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4, 2013, p 705.

③ 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48~73页。

④ 凌胜利:《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10页。

适用于解释它们的选边行为。非联盟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通常表现为政治伙伴关系，例如，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常常出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说法。<sup>①</sup> 政治伙伴关系的建立，往往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功能性利益，通过论坛、多边组织以及双边协调等形式开展有限的功能性务实合作。<sup>②</sup> 由于缺乏或降低了对安全合作的需要，政治伙伴关系间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就政治亲密度而言，伙伴关系国之间大致处于中等水平。在非联盟国家之间，还存在着隐性政治对立与显性政治对立这两种关系。更极端的关系表现为存在公开的敌对或军事对抗，这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亲密度降至负面及以下。

需指出的是，实际的国际博弈格局组合通常十分复杂，比如，第三方国家与博弈国家间的政治亲密度可能处于相同或相近水平，这时，其选边决策并不容易根据政治亲密度简单做出，而会陷入一定的选择困境。

## 2. 经济相互依赖度

尽管政治亲密度为理解国家选边站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参考，但国家间关系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面向，因而其解释力有限。特别是当面临政治亲密度相近的国家的情况时，就需要将其他变量纳入进来，而与国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目标或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则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单元层次参考指标。

有学者认为，“相互依赖让各国利益之间产生直接和积极地联系，其中一个国家立场的改变，也会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产生影响”。<sup>③</sup> 如果将上述观点引入到选边站的研究中，这就意味着双边经济关系将是决定第三方国家是否会加入博弈以及在博弈中站队何方的关键因素。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大国间的博弈结果往往表现为零和，胜者会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可以利用关税、贸易保护条令等多种手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施加压力，因而在被迫卷入国际博弈时，第三方国家往往会选择与其贸易伙伴站在一起。<sup>④</sup> 但是问题在于，

①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84页。

② 同上，第65～95页。

③ Richard Rosecrance *et al.*， “Whither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3， 1977， p. 426.

④ 有学者通过计量模型，结合联盟、地理位置、国家实力等多个因素对国家选边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三方国家更加倾向于同其贸易伙伴站在一起，具体分析参见 Aysegul Aydin， “Choosing Sid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state Disputes”， pp. 1098-1108.

如果第三方国家与博弈双方均存在经济关系时将作何选择？经济相互依赖对第三方国家决策的作用机理如何？现有文献中尚未提供明确答案。本文借鉴马克·克里森兹（Mark J. C. Crescenzi）提出的“退出模型”，<sup>①</sup> 讨论当与博弈双方均存在贸易关系时，影响第三方国家选边决策的决定因素。

克里森兹认为，一个国家在决定是否中断与另一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时，需要同时考虑退出成本和退出门槛，只有当退出成本低于其退出门槛时，该国才有可能中断与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往来。<sup>②</sup> 在国际博弈中，退出成本主要指的是当第三方国家中断与博弈一方的经济联系、转向支持博弈另一方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退出成本越高。退出门槛则指的是第三方国家与其中一方中断经济往来后其所能承受的最大经济损失。<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第三方国家选择博弈中的哪一方，其所能承受的最大经济损失是不变的，<sup>④</sup> 即退出门槛是恒定不变的。基于此，假定博弈双方分别为 A 国和 B 国，第三方国家为 C 国，当 C 与 A、B 均存在经济联系时，可能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见表 1）。

表 1 第三方国家在博弈双方间的选边站情况分类

情形分类	退出成本与退出门槛比较	C 国的决策结果
情形一	C 对 A、B 的退出成本均高于 C 的退出门槛	陷入新的选择困境
情形二	C 对 A、B 的退出成本均低于 C 的退出门槛，且 C 对 A 的退出成本高于 C 对 B 的退出成本	C 选择与退出成本更高的 A 国站在一起
情形三	C 对 A 的退出成本低于 C 的退出门槛，C 对 B 的退出成本高于 C 的退出门槛	C 选择与退出成本高的 B 国站在一起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情形一中，当 C 对 A、B 的退出成本均大于其退出门槛时，C 与其中任何一方中断经济关系转而支持另一方所产生的退出成本均是 C 所无法承受的，此时，作为第三方国家的 C 国将再度陷入选择困境。在情形二中，C 能够承受

① Mark J. C.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5, No. 3, 2003, pp. 809-832.

② Ibid., pp. 811-816.

③ 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131 页。

④ 这里的最大经济损失指一国的最大风险承受能力，由其本身的国家实力所决定，不受博弈两国的影响。



与任何一方中断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退出成本，但选择与 A 站在一起，因为选择 A 所遭受的损失更小。在情形三中，C 可以承受与 A 中断经济关系的退出成本，却无法承受与 B 中断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退出成本，因而 C 更加倾向于支持 B。

换言之，在假定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度越高，在国际博弈选边站中获得第三方国家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 3. 身份相似度

身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揭示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个体借此形成对自我的认识并获得对特定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sup>①</sup> 随着建构主义将社会学思想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身份概念作为“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sup>②</sup> 成为观照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分析工具。在建构主义看来，集体身份是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的独特结合，<sup>③</sup> 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认同的过程，以将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sup>④</sup> 对国家而言，其身份界定与身份认同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及实力状况，还通过话语权力进行构建。话语权力由知识、思想、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等构成，国家间的话语权力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国际体系。事实上，有关“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就已经划下了清晰的界限，界定了行为选择偏好。<sup>⑤</sup> 那么，在面临国际博弈选边站时，不同国家之间的身份异同又是如何对第三方国家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对国家间的身份相似度进行辨析。

首先，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将国家划分为西方式民主国家和非西方式民主国家。<sup>⑥</sup> 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国家政治体制的形式性差异其实并非判别国家身份的根本，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的“民主国家”，更是一种有意识

① 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9～94页。

② 转引自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第91页。

③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④ 同上，第328页。

⑤ Richard Ned Lebow,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08, pp 473-492.

⑥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民主和民主国家的说法，均为西方式民主，即以自由式民主为核心理念，代议制为根本制度架构，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等为基本支柱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参见王宗礼、姜宝莲：《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及其批判》，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12页。

的社会建构与身份认同。<sup>①</sup> 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民主国家概念，既以某些国际规范、思想观念和集体意义定义作为先决条件，同时也以这些条件须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国家才能通过西方社会承认而获得民主国家身份。<sup>②</sup> 这就意味着，西方式民主国家与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更多认同分歧。

其次，根据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等文化属性对国家身份进行界定。尽管在现代世俗社会，宗教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大大退缩，但其仍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提供重要的信仰归宿和精神慰藉，也构成了世界文明的核心底色。<sup>③</sup>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看法，在冷战结束后，传统意识形态将不再重要，文化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将上升，未来各国间将出现“文明的冲突”。<sup>④</sup> 换言之，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他方的关系中来界定，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语言文字等的异同也将影响国家间的沟通、认知与认同，由此出现英语区、法语区等的划分。因而，国家间如果拥有相同宗教或语言等文化上的共性，则更易产生合作。<sup>⑥</sup>

再次，地理和区域也是国家身份和角色的重要划分依据，如东亚、东盟、欧洲、北美等。通过参与地区内的活动，政治领导人可以交流政策信息和想法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从而产生一种共同的地区认同感，某一区域内国家间认同感的出现被视为促进区域合作甚至区域一体化的必备前提。<sup>⑦</sup>

最后，还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等。国家间的这种分类，既由其物质经济基础和能力所决定，也代表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偏好与特定的利益诉求，并在一定程

---

① 李明明：《国际关系集体认同形成的欧洲社会心理学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70页。

② Amy Gurowitz,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Actors, Immigrants and the Japanes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3, 1999, pp 413-445.

③ Errol A. Henderson, "Mistaken Identity: Tes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sis in Light of Democratic Peace Clai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3, 2004, pp 539-554.

④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7页。

⑤ 同上，第109页。

⑥ 刘胜春、阮萍：《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水平——一个基于我国农业领域中“关系”的实证研究》，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66~75页。

⑦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251-277.

度上塑造或影响着国家的行为规范与政策选择。

以上身份并非单一出现，国家往往是多元身份、多种角色的混合体。国家间身份与角色重叠处越多，交集部分越大，则身份相似度与认同度越高；即在假定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双方身份相似度越高，在国际博弈中获得第三方国家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 4. 风险承受能力

国家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是国际博弈选边站中第三方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在国际博弈选边站中，第三方国家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可能打破博弈双方既有的权力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影响，因而，第三方国家必须考虑来自另一方的报复和威胁，其对选边站中相关国家的报复的承受能力必然成为其决策的重要考量之一。

博弈双方对第三方国家的选边决策将会如何反应，是第三方国家需要思考的关键。对博弈双方在应对强度和应对手段上的预测与认知，将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第三方国家的选边决策。而在国际交往中，一种最为常见、也符合通常预期的互动模式是“对等”模式，即一个国家的行为取决于另一个国家之前的行动，是一种大致相等的以善还善、以恶报恶的互动模式。<sup>①</sup> 因为国家间交往大多符合无限重复博弈的特点，而从博弈论看，只有第一次的互动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双方的对等反应才会是平等互惠的，倘若任何一方的行为是以恶意或冲突的方式展开的，另一方必然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如此循环往复，最终通过对等模式实现纳什均衡。<sup>②</sup> 因此，基于对等法则，<sup>③</sup> 选边站实质上是第三方国家与其支持国家的博弈对手冲突的开始，第三方由

① Robert O. 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1986, pp 1-27;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57页。

② 有关国家行为的重复博弈的论述参见 Nimrod Megidido ed, *Essays in Game Theory: In Honor of Michael Maschle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ress, 1994, pp 1-15; 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4~23页。

③ 国际关系中有关“对等”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二是冲突双方的互动会导致持续的、可能升级的冲突。参见 Joshua S. Goldstein, “Great-power Cooper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Reciprocity: From Empirical to Form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53-477; Russell J. Leng and Charles S. Gochman, “Dangerous Disputes: A Study of Conflict Behavior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4, 1982, pp 664-687。

此不得不重视被报复的可能后果。

前景理论是第三方国家预判可能遭到报复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风险决策理论,已成为替代预期效用的主要理论,并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sup>①</sup> 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国家在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与行为选择之前,将会评估另一国可能的反应,该国对另一国反应情况的这种预估,将成为影响该国最终政策与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国际博弈中,第三方国家预期其他国家在其选边后将会如何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选边决策。一般地看,第三方国家一旦明确站队国际博弈中的其中一方,很大可能会遭到来自另一方的打击报复,这种报复的可能性和潜在的损失则构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风险。未被支持的国家是否会对第三方国家采取报复手段,以及报复力度的强弱,将会决定第三方国家所可能承担的风险损失大小。由于支持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风险损失是不同的,而国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比较支持不同国家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状况,构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重要决策依据。

### (三) 国内因素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有关系统因素与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结构性理论解释了为何相似环境的国家尽管存在内部差异却仍做出了相似的决策,<sup>②</sup>但也有学者反对忽视国家间的异质性,<sup>③</sup>认为国内因素在解释国家外交决策差异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sup>④</sup>即国家决策体系内部的结构特征与政治偏好等内生变量,同样对其选边站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而是一个代议性机构,个人和群体的偏好等会通过特定的机构和政治制度等转化为国家政策。<sup>⑤</sup>

---

① Jack S. Levy, "An Introduction to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171-186.

②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4-57.

③ 有关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双层博弈模型的论述,参见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④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1, 1998, pp 289-313.

⑤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553.

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人，需要对相关利益团体负责，因为后者决定了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因而国内行为体对国家的相关决策和国际行为有着巨大影响。<sup>①</sup> 如在许多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即便是处于所谓专制地位的领导人大权独揽，也必须充分照顾由政治精英所组成的利益团体的偏好，其国际博弈的选边站决策中，仍需要考虑国内政治团体的相关利益，<sup>②</sup> 因为其政权的稳定性一方面取决于在选边站后对外部国际冲突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应对外部挑战时能否获得国内的有力支持。布兰登·金恩（Brandon J. Kinne）做了更为详尽的研讨，他认为，不同的专制政权类型对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对于个人独裁政权而言，其地位和政治决策受到敌对派系、军事和地区领导者的共同影响；对于军事独裁政权而言，军队掌权者和其他高级军官所组成的利益团体对领导人的政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sup>③</sup> 对于西方式民主国家而言，其行政决策的推出，在短期内要受到“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议会等其他权力机构的制约，在中期内要考虑选举因素的影响。来自议会与社会层面的支持与反对，无论这种意见是出自执政党内部或反对党，都会影响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和行政部门的社会形象与威望，这对其能否继续顺利执政和能否再次胜选至关重要。因而，尽管行政部门看似大权在握，但在施政过程中也将不得不重视与其相左的反对声音。考虑并吸收各方反对意见，有助于减少领导者可能会受到的政治压力与民意反弹。

总之，无论是何种政体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博弈选边站中的决策都会受到国内行为体的影响，诸如选民、反对派等所组成的国内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政治生命，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国际博弈选边决策中必须考虑国内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 （四）议题因素

国际博弈往往围绕着特定的议题展开，第三方国家的选边站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议题的性质或意义。美苏冷战期间的博弈属于两极格局之下的零和博弈，此时的世界格局主要体现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因而在

①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② Jessica L. Weeks, "Strongmen and Straw M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Ini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2, 2012, pp 326-347.

③ Brandon J. Kinne, "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 A Poly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2005, pp 114-128.

美苏博弈期间，不同阵营的国家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上往往会全力支持自身阵营内的领导国，即要么全面支持美国，要么全面支持苏联。而在后冷战时代，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再完全表现为零和博弈，第三方国家的选边决策也不再表现出绝对的倾向性，即便是博弈在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进行，第三方国家也可能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异的选边站决策。

不同国家对相同议题重要性程度的认知也会存在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同一外交事件的处理会存在差异，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其首要考量是议题是否会对本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也类似，其关注的重点，要看议题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既有地位或相对权力是否会带来冲击，其次才会考虑其对国家经济、安全或文化等方面的利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以及独立自主性等问题上也较敏感，但是议题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其考虑的重点，在对其国家安全状况不会产生显著风险的情形下，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政治上的支持和回报，不排除部分发展中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主权方面的让步。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对议题的重要性进行评估，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议题本身的性质和影响力的大小两个方面。就议题的性质而言，主要包括议题是否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是否牵涉国家的核心政治利益如主权、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等方面；经济类议题方面，则要看其所牵涉的产业或经济部门是否为国家战略性、命脉性或支柱性行业，是否会对国家的核心经济优势产生影响。就议题的影响力大小而言，则指其牵涉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是否具备足够的数量或规模，是否足以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或较多的利益关联方。此外，不同国家在对待相同议题的看法上有着不同的认知和价值排序，通常而论，被纳入选边站的议题，也可分为“高政治”和“低政治”两大类，在决策的时候，高政治类议题的重要性明显大于低政治类议题。

#### （五）各层次因素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分析是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探究体系层次因素、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第三方选边站决策所产生的单独的影响。然而，国家的外交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仅从单一变量衡量明显缺乏说服力，还需考虑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

如前所述,国家的对外行为必然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无论第三方国家是主动介入还是被迫卷入国际博弈中,都无法回避现实主义的影响。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将限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回旋空间,国家在对外行为选择上很难随心所欲,而不得不遵从国际权力结构的约束行事。与此同时,在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限定下的有限政策选择集合内,国家对外决策又将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政体类型、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决策者的目标偏好等,都使得处于“单元”层次的国家行为可能发生复杂变异。国际体系、国家单元与国内因素这三个层次事实上构成了理解国家对外行为决策的宏观背景,这对国际博弈中第三方国家的行为选择也完全适用。

在进一步分析国际体系、国家单元与国内因素三者间的互动时,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探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对国内选举、贸易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的影响。<sup>①</sup>具体来看,国际体系和国家单元层次的影响主要通过跨国产业链、供应链和资本跨国流动等渠道渗透到国内社会,进而影响国内力量、利益格局和对外政策的重塑调整,反过来,国内社会的变化与国内政治的输出结果又进一步巩固或修正了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结构。为此,有学者指出,国际结构既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sup>②</sup>然而,问题在于,国际体系、国家间单元层次结构与国内政治这三种力量又是如何作用于国家在第三方行为体的选边决策的呢?在此,引入议题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学者们若聚焦在二维平面来探讨国际体系与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sup>③</sup>只能概括性说明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一般性特点,却难以对国家面临的特定政策选择做出准确的解释或预测,而这实际上与议题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有着高度的关

① Nita Rudra,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4, 2005, pp 704-730; Alicia Adsera and Boix Carles, "Trade, Democracy and the Size of the Public Sector: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Open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229-262.

②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p 881-912.

③ Stephen Chaudoin *et al.*,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Link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Empir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2, 2015, p 278.

联。国际体系、国家间单元层次结构与国内因素这三者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都是通过广泛而具体的议题或议程得到传导和体现的。由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决定了国家所处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单元层次因素则是对国家间双边关系结构的反映，二者均是对国家外部环境的写照，在研究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可被归为一类，即外部因素。由此，可由国际体系层次、国家间单元层次、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个维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起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的理论框架，用以衡量各因素对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的综合影响。

由于国际博弈主体至少涉及两个国家，因而，第三方国家对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选边选择，都可从以上理论框架角度进行单独衡量，在对衡量结果比较评判后，确定在博弈中的最终选边决策结果。图 1 反映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决策过程。假设国际博弈只涉及 A、B 两个国家，图中的 O 点则代表了第三方国家在 A、B 两国博弈时所处的中立位置，OG 和 OG' 的位置则分别由第三方国家对选择支持 A 国或 B 国的意愿大小而决定，该意愿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第三方国家对选边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衡量的结果。OG 或 OG' 的距离越长，表示 A 国或 B 国对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影响力越大，第三方国家也越倾向于在博弈议题上支持该国。需指出的是，国际博弈可能会牵涉多个第三方国家，而每个独立的第三方国家综合衡量的结果会存在差异，因而在选边站时，不同的第三方国家，其站队选择也会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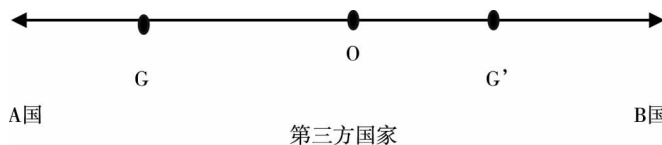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博弈下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同表 1

### 三、案例探讨：英国基于中美 5G 博弈的选边站决策

#### （一）背景：中美 5G 博弈的由来与发展

2017 年以来，中美之间摩擦频繁，冲突程度不断加剧，双方的博弈已由



最初的贸易摩擦扩展到区域战略、高新技术等领域。<sup>①</sup> 2018 年, 美国对中兴通讯公司展开制裁,<sup>②</sup> 标志着美国的新一轮对华科技制裁拉开帷幕, 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先进电信技术成为美国对华技术遏制的重点, 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顶尖电信企业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sup>③</sup> 围绕 5G 展开的博弈, 正成为当前中美两国博弈的焦点所在。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 通常是指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特点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 5G 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对数据的蓬勃需求, 成为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潮流所向。据预测, 到 2021 年, 全球数据产生量将达到 49 艾字节 (EB), 是 2016 年的 7 倍。<sup>④</sup> 不断增长的数据需求对移动通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快建设 5G 网络势在必行。作为一项革新性新技术, 5G 技术还具有强大的外溢和倍增效应。基于“5G+”的新媒体、金融科技、智慧教育、医疗、智慧城市、万物互联、区块链等场景的应用, 将大大推动产业数字化或数字产业化进程, 刺激数字经济迅猛增长, 5G 由此将成为助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也因此逐渐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领域之一。

中美 5G 博弈首先围绕 5G 技术标准的制定而展开。美国商务部先是禁止美国公司与华为有所接触, 从而阻断了双方在 5G 技术标准上的交流, 但囿于华为在 5G 标准专利和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领域强大的话语权, 美国随后放松了这一限制。<sup>⑤</sup> 美国对华为禁令的先紧后松也从侧面反映出华为公司已经成为 5G 顶层竞争中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 华为公司与美国

① Xiangning Wu, “Technology, Power and Uncontrolled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 No 1, 2020, pp. 99-101.

② 《中兴通讯: 美禁令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 不能接受》, 新华网, 2018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4/20/c\\_1122713284.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4/20/c_1122713284.htm)。

③ Xiangning Wu, “Technology, Power and Uncontrolled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99-115.

④ EB 是计算机存储容量单位, 全称 Exabyte, 中文名叫艾字节。参见陈晓华、吴家富主编: 《5G 新动能: 数字经济时代的加速器》,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4 页。

⑤ Karen Freifeld and David Shepardson, “U. S. Companies can Work with Huawei on 5G, other Standards; Commerce Department”, Reuters, June 16,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huawei-tech-exclusive-idUSKBN23M2DF>; 3GPP 全称为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建立于 1998 年 12 月, 5G 技术标准由 3GPP 来制定。

公司在 5G 标准制定上的博弈则体现出中美两国政府在争夺科技话语主导权上的较量。

其次，美国还利用其供应链霸权，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展开对华为 5G 的全方位制裁。<sup>①</sup> 在产业链上游，美国通过控制对华为的芯片销售进而遏制华为 5G 的发展，美国芯片制造厂商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优势为美国从供给侧限制中国 5G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sup>②</sup> 在产业链中游，美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禁止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sup>③</sup> 美国对华为 5G 产业链下游的制裁主要体现在软件应用上，先后对抖音（TikTok）、微信、支付宝、金山软件（WPS）等来自中国的移动应用程序进行封杀。<sup>④</sup>

在中美新一轮经济、技术博弈的时代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其盟友和非盟友采用了持续的高压政策，以期在中美博弈中获得来自第三方国家的支持。中美 5G 技术博弈的展开以及美国的极限施压，致使位于 5G 产品网络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国家需要做出站队选择。

以下将前文的理论分析与中美技术、经济博弈背景相结合，探究在 5G 博弈中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案例对所选因素进行检验。本文拟选取英国的 5G 决策作为案例，原因在于：英国与华为公司的接触时间较长，双方自 2010 年就开展了业务合作，对于美国对华为公司制裁所提出的所谓几点“理由”，<sup>⑤</sup> 英国一直以来都在对华为公司的产品进行安全评估，因而具有较为丰富的资料支撑，对理论检验亦有较强的说服力。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基于 5G 技术的产业数字化效应愈发得到释放和显现，中美围绕 5G 等先进技术而展开的国际博弈还将愈加激烈且长期存在，或将有更多的第三方国家被卷入其中，因此，以中美 5G 博弈中英国作为第三方

---

① 李巍、李琦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载《当代亚太》2021 年第 1 期，第 28～44 页。

② 《2020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市场分析：市场规模下滑、美国市场仍占据主导地位》，前端产业研究院，2020 年 7 月 2 日，<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00702-3e144f1c.html>。

③ Satoru Mori, “U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Digital Network Dimensions”, *Asia-Pacific Review*, Vol 26, No 1, 2019, p. 81.

④ Ana Swanson, “Trump Bans Alipay and 7 Other Chinese App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5/technology/china-app-ban.html>.

⑤ Chad P. Bown, “How the United States Marche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to Its Trade War with China”,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Vol 24, No 4, 2020, p. 350.

国家的表现为例，研究其选边行为表现及逻辑机理，对于中国预判其他第三方国家的选边行为，提前制定好对策，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和中国技术顺利开展海外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二）英国关于华为 5G 的选择困境

随着中美 5G 博弈的加剧，英国的决策者面临着以下选择困境——是选择华为及其背后的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同盟友美国站在一起共同遏制来自中国的新技术扩散？抑或是采取中立战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基于前述理论框架，本文尝试从国际体系和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三个角度，对英国 5G 选择的动因进行分析。

### 1. 国际体系和单元层次因素

从国际体系层次看，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和中美间战略竞争的加剧，国际格局正由美国的一家独大向新的两极世界转变，只是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不同的是，在隐现的新格局中，当前中美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科技领域展开的数字竞争，而非此前的意识形态的对立。<sup>①</sup>在这场中美 5G 竞争中，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融入发展 5G 的全球化潮流，必须选择自身尚不具备的国外先进 5G 技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到中美两国的数字博弈中，成为中美两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换言之，体系因素决定了英国很难置身事外，必然成为中美 5G 博弈中的第三方国家。然而，由于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综合实力较强，在全球事务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因而并不能轻易为中美任何一国所左右。换言之，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赋予了其在中美 5G 竞争中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度。

从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来看，主要是政治亲密度、经济相互依赖度、身份相似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英国决策者的选边决策。

一是政治亲密度的分析。根据前述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逻辑中政治亲密度的作用机理，首先对中美 5G 博弈中，英国与博弈双方的政治亲密度进行梳理。中国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英国与中国不存在联盟关系。与此相对，美英之间的联盟关系历史久远，双方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均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可以说，两国是国际社会中最牢固的一对长期盟友。很显然，英国与美国的政治亲密度远远高于中国。根据前述理论

<sup>①</sup> Xuotong Yan, “Bipolar Rivalry in the Early Digital A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 314.

框架，或可认为，在中美 5G 博弈的选择上，基于政治关系的考量，英国并不存在选择困境，其会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即弃用华为 5G 设备与技术。但是实际的决策过程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在联盟伙伴的背景下，英美围绕是否选择华为 5G 设备与技术进行了三轮政治博弈。

2018 年 7 月，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监督委员会（HCSEC）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华为设备在英国网络中存在漏洞，HCSEC 只能就华为参与英国网络建设不会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提供有限保证。这一表述实际上并未彻底排除采用华为的可能性。<sup>①</sup> 同年 11 月，美国政府表示，与其存在军事合作的国家若使用华为设备，可能会对双方的军事合作和情报安全构成影响，出于此种担忧，美国决定劝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等盟友放弃使用华为设备。<sup>②</sup> 但在 2019 年 2 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又表示，英国政府有能力降低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这标志着在华为问题上英美第一次分歧的产生。<sup>③</sup>

第一回合交锋英美双方虽然都表达了自己对于华为问题的不同态度，但碍于特殊的联盟关系，双方并未“短兵相接”，而是出现了间接博弈。为防止英国态度的扩散效应，美国警告德国：“允许华为或其他中国设备供应商参与 5G 项目，将意味着美国无法再与德国安全机构保持相同力度的合作。”<sup>④</sup> 这是美国首次利用联盟关系警告盟友，如果在 5G 问题上继续选择华为设备，将会减少与德国的安全合作，同时也意在向英国此前的表态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但美国利用对盟友的警告从而间接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做法收效甚微，双方很快迎来了第二回合的较量。2019 年 4 月 23 日，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

① *Huawei Cyber Security Evaluation Center Oversight Board Annual Report*,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Cabinet Off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UK, July 19, 2018, pp. 2-4.

② Stu Woo and Kate O’Keeffe, “Washington Asks Allies to Drop Huawei”,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3,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washington-asks-allies-to-drop-huawei-1542965105>.

③ Demetri Sevastopulo and David Bond, “UK Says Huawei is Manageable Risk to 5G”,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619f9df4-32c2-11e9-bd3a-8b2a211d90d5>.

④ Bojan Pancevski and Sara Germano, “Drop Huawei or See Intelligence Sharing Pared Back, U. S. Tells German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drop-huawei-or-see-intelligence-sharing-pared-back-u-s-tells-germany-11552314827>.

(NSC) 内部会议决定让华为参与英国 5G 非核心网络建设的消息不胫而走, 被提前披露给媒体。<sup>①</sup> 这无疑刺痛了美国的神经, 这与美国欲让欧洲禁用华为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接下来的 4 月 29 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空间和国际通讯及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尔 (Robert Strayer) 表示: “华为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如果其他国家允许不受信赖的供应商加入其电信网络, 美国将重新评估与其的情报分享体系。”<sup>②</sup> 这是英美有关华为问题产生的第二次分歧, 同时也是美国首次利用联盟情报关系对英国施加的直接压力。但英美的第二次交锋依旧没有胜者, 英国决定彻查会议泄密事件。然而此时, 英国又遇到了脱欧公投、时任首相特蕾莎·梅即将卸任等一系列问题, 不得不搁置了有关是否采纳华为 5G 的决定, 并将这一选择难题抛给了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约翰逊从特蕾莎·梅手中接过保守党党首和英国首相职位后, 面临着与其前任相似的困境。一方面, 英国脱欧后, 需要维持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密切合作, 以寻求经济的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 其在安全领域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与合作, 因而在华为问题上, 约翰逊也很难轻易做出决断。

2020 年 1 月 15 日,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致信英国首相, 呼吁尽快将华为相关设备排除在英国 5G 的基础设施建设外, 否则将对“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产生影响。<sup>③</sup> 然而, 即便面对如此高强度的联盟压力, 英国首相约翰逊仍于 2020 年 1 月月底公布了在该问题上的最终决定: 允许高风险供应商参与网络非核心部分的建设, 但其市场份额将被限定在 35% 以内, 并且这一指标在日后还将重新评估以视情况调整, 以确保供应商的多元化。<sup>④</sup> 英美两国关于华为 5G 的第三轮博弈就此展开。此后, 英国政府利用

① Sebastian Payne and James Blitz, “UK Launches High-level Probe into Unprecedented Huawei Leak”,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22388be0-674b-11e9-9adc-98bfd35a056>.

② Alexander J Martin, “US May Withhold Intelligence from UK over Huawei 5G Plans”, Sky News, April 29, 2019, <https://news.sky.com/story/us-may-withhold-intelligence-from-uk-over-huawei-5g-plans-11707070>.

③ “Rubio Urge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to Exclude Huawei in the United Kingdom’s 5G Infrastructure”, January 15, 2020,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BEADAC26-0C8C-4C7F-BFA2-A2C50AFA6A72>.

④ 《英国政府决定让华为“有限”参与 5G 建设》, 新华网, 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29/c\\_112551001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29/c_1125510011.htm).

有限参与、部分禁止等策略巧妙地回应了美国的压力，同时维持着同中国的关系，继续在中美之间游走。但美国对自己的情报联盟伙伴使用中国的设备仍持零容忍态度。在英国正式公布允许华为部分参与其 5G 建设的决定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与英国的情报共享是否会减少取决于英国对美国提议的采纳程度，并表示英国有机会再次改变其决定。<sup>①</sup> 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发出警告，提出如果欧洲国家继续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的技术，包括北约在内的军事联盟将处于危险之中，华为设备将对北约的情报共享产生威胁。<sup>②</sup> 尽管英国在 2020 年 7 月再次改变了允许高风险供应商有限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想法，最终全面禁止使用华为设备，<sup>③</sup> 但从英美前几轮的博弈来看，美国从情报共享和军事安全两个层面，利用联盟向英国施压，仅从政治亲密度这一单一变量来看并未取得显著效果。这表明，首相约翰逊和其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二是经济相互依赖度的分析。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与中美等国均存在着长期而密切的经贸往来，经济因素也是英国在面对中美 5G 博弈选择难题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贸易依存度来反映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并以此衡量切断两国经济联系的退出成本。根据 2010～2019 年英国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可计算出英国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如图 2 所示）。

根据前述理论，当英国与中美两国均存在经济联系时，其选边站决策将取决于其退出门槛与退出成本的比较结果。由于难以根据现有数据大致测算出英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退出门槛，即英国为切断与中国或美国任一方经济联系而所愿意承担的最大经济损失，因此，只能假定在退出门槛恒定的前提下，考虑经济退出成本的高低对英国选边站决策的可能影响。根据英国对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情况所表明的经济退出成本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于英国

---

① Dan Sabbagh and Patrick Wintour, “UK has Chance to Relook at Huawei 5G Decision, Says Pompeo”, The Guardian, January 29,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jan/29/uk-chance-relook-huawei-5g-decision-mike-pompeo>.

② Patrick Wintour, “US Defence Secretary Warns Huawei 5G Will Put Alliances at Risk”, The Guardian, February 15,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feb/15/us-defence-secretary-warns-us-alliances-at-risk-from-huawei-5g>.

③ Leo Kelion, “Huawei 5G Kit must be Removed from UK by 2027”, July 14, 2020,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3403793>.

对中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均不算低，经济退出成本可能会高出退出门槛，因而英国难以舍弃与任何一国的经贸往来，继而也难以仅凭经济因素而在华为问题上做出选择；二是由于总体上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本着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英国对中国的退出成本相对更小，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度相对更低，有可能会选择放弃华为 5G 而倒向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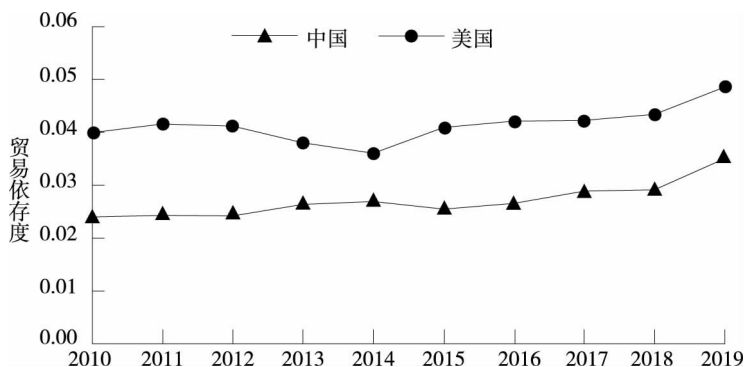


图2 英国分别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EIC 全球经济数据库相关数据绘制，参见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

然而，从英国的实际表现看，英国在同美国的前三轮博弈中均倾向于允许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但又在 2020 年 7 月最终改变其决定（未来也不排除再度反复），这表明，英国政府的行为落入了第一种可能，即不愿仅仅根据经济依赖度的高低而做出选边决策，陷入了选择困境。

三是身份相似度的分析。从政治制度角度看，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更加倾向于结盟。<sup>①</sup> 美英两国的联盟关系根深蒂固，且同属西方国家阵营，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英美在政体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理由推断，在华为 5G 的选择上，英国更加倾向于美国。从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的角度看，英国和美国堪称同宗同源，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语言文字，都属于同一体系，即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英语语系国家，且美国有着大量的英

<sup>①</sup> Michael W. Simon and Erik Gartzke, “Political System Similarity and the Choice of Allies: Do Democracies Flock Together, or Do Opposites Attra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0, No. 4, 1996, pp. 633.

国移民，因而两国在文化特性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sup>①</sup> 中国则是有着古老东方文明的大国，无论是在传统文化、语言文字抑或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与英美大相径庭，因而英国在身份认同上极大偏向于美国一方。再从地理位置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角度看，英美两国的身份相似度也远高于英中两国。英美两国虽然间隔太平洋，但互动交往频繁深入；两国也同属老牌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后起的新兴大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对身份相似度的分析表明，英国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决策中，毫无疑问也应倒向美国一方，然而事实却是，在历经了诸多反复和政府轮替后，英国才做出了截至目前的“最终”决定，这表明，身份相似度因素也不足以支持选边决策。

四是风险承受能力分析。这里的风险具体是指在 5G 技术上，英国无论是选择抑或是弃用华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来自美国或中国的报复而面临损失的不确定性。英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取决于其对可能遭受到的中美各自报复前景进行的评估与比较，最后根据对损失的评估预期做出选边站决策。对于中美可能采取的报复手段和报复力度，可以从相关新闻报道和中美官方声明中窥得一二。

美国对英国的可能报复主要来自安全防务领域。在英国正式宣布允许华为参与其 5G 非核心网络建设后，2020 年 2 月，美国借口担心英国引入华为 5G 会给双方的情报共享带来隐患，表示考虑限制在美国从事敏感任务（如核项目、无人机技术等）的英国科学家的安全访问权限，限制交换来自美国侦察卫星的敏感数据。<sup>②</sup> 同年 3 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了一项由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领导的跨部门审查，以确定美国是否需要将军事和情报资产从英国迁走。<sup>③</sup> 2020 年 5 月初，美国国会对即将出台的国防预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欲阻止在 5G 或 6G 网络中使用高风险供应商的国家

---

① Neal M. Ashkanasy *et al.*, “The Anglo Cluster: Legacy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7, No 1, 2002, pp 28-39.

② Glen Owen, “Trump’s Rage at Huawei ‘Betrayal’: Fears that US Will Restrict Amount of Intelligence It Shares with Britain as Special Relationship Suffers Major Rift”, *The Mail On Sunday*, February 22, 2020,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033065/Trumps-rage-Huawei-betrayal-Fears-restrict-intelligence-shares-Britain.html>

③ Michael Sobolik, “Mend the Gap: 5G, the US-UK Split over Huawei,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Defense Technology Program Brief*, AFPC, No 19, March, 2019,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policy-papers/mend-the-gap-5g-the-us-uk-split-over-huawei-and-national-security-implications>



购买其 F-35 战机，其中自然包括英国，这也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sup>①</sup>

中国的态度主要通过驻英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等渠道表露出来。2019 年 6 月，中国驻英大使表示，英国禁用华为设备将对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释放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即英国无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友善的营商环境，这不仅会影响到中英贸易，还会对中国对英投资发出十分负面的信号。<sup>②</sup> 此后，中国驻英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相继通过报纸或公开场合发表声明：“禁用华为会打击外国投资者对英国未来的信心，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sup>③</sup> 通过上述表态可见，美国对英国的反击已经超出了“对等反应”的程度：其将跨国公司经营这一低政治问题高级化，从国家安全角度来威胁英国；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则基本遵循了“对等原则”，仅从贸易和投资角度对英国提出警示。根据两国政府的反应程度，显而易见的是，英国选择华为 5G 所可能承受的“打击报复”强度将远远高于弃用，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将使英国意识到选择华为很可能付出巨大代价。<sup>④</sup>

## 2. 国内因素

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不同的是，英国作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其国内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多元声音、不同主张。其选边站决策除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通过梳理英国国内政治压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华为问题上，首相多次面临国内施压，进而使其立场出现了摇摆和变化。

2019 年 4 月，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因

① Russell Huang and Grant W. Turner, “5G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ow the UK can Lead the Way”, July 30, 2020, p 3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46339](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46339).

② 田学科：《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希望英国能够继续与华为合作》，中国科技网，2019 年 6 月 24 日，[http://www.stdaily.com/guojiluntan/2019-06/24/content\\_773615.shtml](http://www.stdaily.com/guojiluntan/2019-06/24/content_773615.shtml)。

③ 《中国驻英大使：禁止华为将使英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落后》，新华网，2020 年 1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06/c\\_1125426418.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06/c_1125426418.htm)；《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英国禁用华为的决定答记者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020 年 7 月 15 日，<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chn/zygx/t1798143.htm>。

④ 在对英国的案例分析中，虽然风险承受能力包含了安全和经济两个因素，看似与政治亲密度和经济相互依赖度存在重叠，但应区分的是，政治亲密度是美国利用联盟关系对英国的安全合作施加的影响，而风险承受能力因素里美国的报复手段仅仅只是其所采取的单边措施。经济相互依赖度指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联系，是整体经济联系，而风险承受能力中采取的经济反制手段仅仅针对特定议题下，对华为问题采取的经济报复。

涉嫌泄露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的决议而被解职。<sup>①</sup> 有学者认为,威廉姆森自知无力改变该决定,因此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将高层决议公之于众,借助外力倒逼政府,以期使该决议改弦更张。<sup>②</sup> 此次事件可以被视为国内力量倒逼首相决议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威廉姆森对赌失败被革职,但也确实对阻止该决议的公布起到了正向作用,直至特蕾莎·梅卸任,英国政府也始终未宣布对华为的决定。

第二轮施压是在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后。2020年1月,英国正式对外宣布决定允许华为有限参与5G网络建设,两个月后,英国议会部分议员提出一项修正案,希望政府在2022年之前将华为从英国5G网络中剔除出去,但下议院以306票对282票对该提案进行了否决。<sup>③</sup> 虽然议会内部反对采用华为设备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英国行政高层也做出了让步,如提出要加强对华为的监督,对所谓的“不正当行为”加强管制以安抚内部异议。<sup>④</sup>

经过了前两轮的反,英国右翼势力反对华为的情绪空前高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尤为明显。2020年4月4日,在首相约翰逊因新冠肺炎住院的前一天,15名保守党议员给其联名写信,请求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sup>⑤</sup> 此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也转嫁到对中国公司的抵制上。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约翰逊的立场也首次出现动摇,表示希望缩减在英国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数量。<sup>⑥</sup>

通过分析英国政坛内部对首相的几轮施压情况可以发现,英国国内政治势力对阻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尽管其效果相对有限,但其推动力量却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最终对首相在5G博弈上的

---

① 《英国国防大臣因泄密被解职》,新华网,2019年5月2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02/c\\_1124443129.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02/c_1124443129.htm)。

② 刘晋:《英国对华为参与5G建设的立场及其走势》,载王展鹏、徐瑞珂主编:《英国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318页。

③ 杜晓颖:《英国下议院表决,维持政府允许华为有限参与英国5G建设的决定》,中国日报网,2020年3月11日,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3/11/WS5e67f4f1a3107bb6b57a5b0e.html>。

④ Helen Warrell *et al.*, “UK Ministers Seek to Placate Tory Rebels over Huawei Deal”, *Financial Times*, March 13,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c8144666-6516-11ea-b3f3-fe4680ea68b5>。

⑤ 纪双城、孙微等:《决定开放后又重新评估,英国对华为的态度为何反反复复?》,环球网,2020年6月9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yZq82CHUIo>。

⑥ Dan Sabbagh, “Boris Johnson Forced to Reduce Huawei’s Role in UK’s 5G Networks”, *The Guardian*, May 22,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may/22/boris-johnson-forced-to-reduce-huaweis-role-in-uks-5g-networks>。

选边决策调整发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 3. 议题因素

在当今国际格局的博弈中，第三方国家往往在特定事件上表现出选择性偏好。作为一个特定议题，5G 对英国的选边站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议题因素对英国 5G 决策的影响基于两个基本的考量：一是对 5G 成本—收益的考量，二是 5G 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作为 5G 行业的领头羊，华为已在英国深耕多年，如果继续选择与华为合作，将有助于英国守住在 5G 领域的先发优势，继续享受 5G 技术创造的数字经济红利，进一步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但倘若英国放弃华为，则不仅可能要承担失去全球 5G 领导者所带来的重置成本、沉没成本，还要考虑选择其他供应商的转换成本和失去 5G 产业溢出红利的机会成本。

有报告指出，若 5G 建设整体推迟 3 年，给英国相关行业带来的损失将高达 182 亿英镑。<sup>①</sup> 不仅如此，如果华为在全球市场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其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将分别增长至 42% 和 39%，由于这两家替代者的成本和价格更高，这将导致到 2023 年，英国将有 730 万人因华为的离开而无法使用 5G 网络。<sup>②</sup> 从成本角度看，放弃华为设备将为英国带来可能高达百亿英镑计的经济损失，英国的决策者们应该对可能付出的潜在经济代价进行了评估衡量，但华为却依旧未能逃脱被封禁的命运，这说明与经济因素相比，议题所牵涉的安全属性可能对第三方国家的影响更大。

要判断 5G 是否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影响，首先要分析英国对 5G 的认知，不同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英国政府虽然在一系列安全评估的基础上将华为列为高风险供应商，但在起初仍表态允许华为为有限参与 5G 非核心网络的建设。这说明，英国对 5G 安全的认知虽然可能到达国家安全层面，但仍认为风险是可控的，因而只对华为设备进行有限封禁，并不打算彻底放弃。但英美就边缘与核心网络对安全的影响存在明显分歧，在美国看来，仅将华为限制在非核心网络的建设仍无济于事，仍然有可能对

① “A Report for Huawei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a Delayed 5G Roll-out in the UK”, Assembly Research, September 2020, [https://telcoprofessionals.com/public/admin/Macroeconomic%20impact%20of%20a%20delayed%205G%20roll-out%20in%20the%20UK%5b2%5d%20\(2\).pdf](https://telcoprofessionals.com/public/admin/Macroeconomic%20impact%20of%20a%20delayed%205G%20roll-out%20in%20the%20UK%5b2%5d%20(2).pdf)

② Henry Worthington ed.,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5G Network Equipment Throughout Europe”, Oxford Economics and Huawei, June 2020, pp 13-81, <https://www.oxfordsci.com/recent-releases/The-Economic-Impact-of-Restricting-Competition-in-5G-Network-Equipment>

情报共享和北约的军事安全等构成“威胁”。正是由于两国对风险认知的差异，导致英国的第一次决策与美国意见相左。

从议题的角度看，是什么因素迫使英国在 2020 年 7 月改变其决定呢？由于风险认知上的差异使美国无法说服英国，美国转而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以使英国改变决定，即从供应链安全入手，再度加大对华为供应链的管控力度。由于供应链安全是整个 5G 安全的基石，如果供应链出现风险，那么也将对后续应用环节的安全带来风险。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加大了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措施，这意味着华为的手机制造、计算机和 5G 设备等将面临“断芯”的风险，而芯片的缺失对华为的打击将是巨大的。<sup>①</sup> 英国深知芯片对华为的重要程度，在美国宣布禁令后，英国重新评估之前的决定，并最终宣布在 2027 年之前逐步淘汰英国网络中的所有华为设备。这意味着供应链制裁大大增加了使用华为设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英国不再有信心能控制使用华为设备的安全风险。<sup>②</sup> 5G 议题的自身特点，或可被视为迫使英国最终改变其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可能与国家安全问题存在的内在关联，导致 5G 议题被上升到事关国家和整个联盟体系安全的高度，因而 5G 议题自身的分量，可能超出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英国在几经周折后，做出了前后不一的选边选择。

#### 4.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影响英国 5G 决策的国际体系和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进行单独分析后，我们将上述因素纳入英国 5G 决策的时间序列中进行联动分析，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经济相互依赖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出现在了英国 5G 决策的各个时期，因为英国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大体稳定的，中美两国对英国的选边站决策可能采取的反制手段也随着博弈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增强，并且前述分析已经阐明，这两大因素均对英国弃用华为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体现出单元层次变量对选边决策的影响。尽管该层次因素明显有利于英

---

① “US Targets Huawei with Tighter Chip Export Rules”, BBC News, May 15, 2020,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2681414>.

② Kathryn Waldron, “Huawei and National Security: Lessons for 6G”, R Street Policy Study, No 24, September 2020, <https://www.rstreet.org/2020/09/21/huawei-and-national-security-lessons-for-5g/>.

国偏向美国立场，但由于国际体系赋予了英国较高的决策自由度，使得英国于 2020 年 7 月最终做出倒向美国的决定前，其前三次的选边决策均倾向于中国。然而，国内因素的引入，进一步加重了英国选边美国的砝码，并使之超出了由议题因素本身推动英国选边中国的分量，令英国此次选边决策以倒向美国而告一段落。而细究华为被迫出局的原因，就会发现，主要在于自身优势过于单一，全程仅靠议题因素支撑，当该优势也被博弈对手所破解时，就难以抗衡对手在多层次变量上所具备的综合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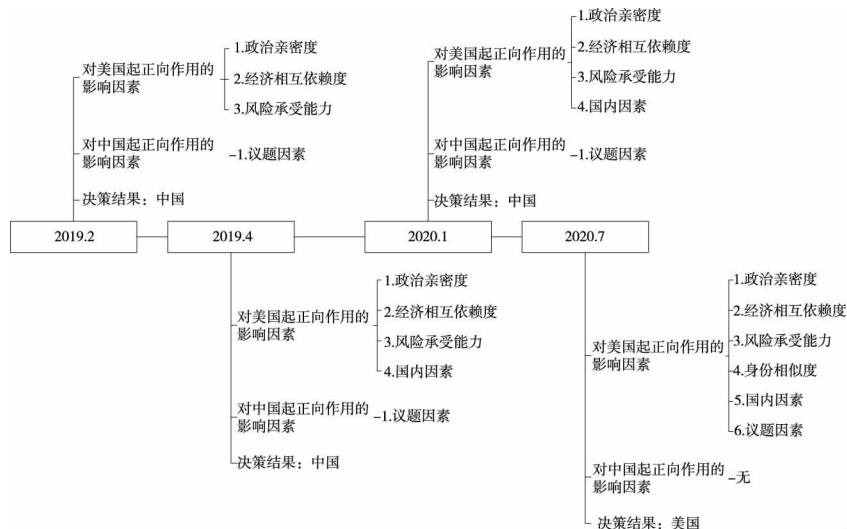


图 3 英国 5G 决策时间轴

资料来源：同表 1

第三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博弈选边站决策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看似仅由某单一议题所引起的选边问题，却往往牵涉多层次因素互动、多轮较量与反复权衡算计。正如英国对华为 5G 的态度，就曾经历了表示能应对华为 5G 可能出现的风险、允许其进入非核心网络建设到全面禁用这三个阶段的转变，充分显示出体系、单元、国内以及议题等各方面因素在时间序列中发挥各方向作用而不断形成合力的不同结果。这对理解或分析其他选边站现象也颇有启发。

## 四、结 论

在当前中美间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各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不选边对于博弈当事国而言，也是一种选边，即对有选边诉求之方的拒绝。因此，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其中，国际体系因素决定了国家决策选择的自由度，是第三方国家选边站决策的先导条件。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主要包括政治亲密度、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和身份相似度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国内因素则指国家决策体系内部的结构特征与政治偏好等，议题因素则与议题本身的性质及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相关。这四大因素中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最终决策。

结合以上理论框架，本文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 5G 博弈上的选边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就未来的研究而言，可以围绕其他国家或其他相关议题展开，也可将该分析框架提出的相关变量进行定量化建模分析，为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国家的选边站行为提供新的见解。

E. U. will in turn result in a European policy of isolation from China, while U. S. signals to India that intends to enhance ties may cause the later to adopt a more adversarial policy towards China. Meanwhile, Russian policy to China is not impacted by the U. S. policy towards Russia. Based on the above, should China-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 to intensify, China-Russia relations may become less stable, and a passive situation where both India and Russia even represent a challenge to China may emerge. For its part, the European Union may come to offer China an important outlet for reducing its external strategic pressure.

**Key Words:** Sino-U. S. -Russia Strategic Triangle; Sino-U. S. -India Strategic Triangle; Sino-U. S. -Europe Strategic Triangle; Sino-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Large-N Data

**About the Author:** Cao W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On “Taking Sid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sts

Zhang Li and Hu Dayi

**Abstract:** A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increasingly evident, complex and intense, third-party states are finding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avoiding “taking sid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internal logic followed by third party states in taking sides from a rationalist perspective. It identifi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taking sides represents a rational foreign policy choice of states that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four factors: international systems level factors, inter-state level factors, domestic structural factors; and issue-based factors. Variables relevant to each of these factor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ir combined effect on a specific issue will ultimately influence a state’s decision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sid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how the UK took sides vis-à-vis and contest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over Huawei’s 5G network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is choice. Using this case,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role of systems level and inter-state leve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issue-based factors on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side-taki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ntest; Taking Sides; Third-party State; Huawei 5G

**About the Authors:** Zhang Li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Sichu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Hu Dayi is a MA Student in the class of 2020 at the Sichu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 Global Climate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Green Silk Road: An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Zhou Yamin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oretical architecture of realizing global climate good governance, summarizes the